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三皇五帝大传”系列

杨复竣 著



中华始祖

太昊

伏羲

羲



作为“三皇五帝”之首的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始祖，他开创了6000多年前的中华远古文明，他开创先天八卦，他创始中华龙徽，他是中国龙的鼻祖，他被民间尊为‘人祖爷’，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在河南淮阳太昊伏羲陵，万众朝拜太昊伏羲，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八次伏羲崇拜高潮。如今太昊伏羲陵正被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一书正是以太昊伏羲的一生传奇和他身后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论述中国古史帝王世系、中华始祖、中华龙、国祭伏羲等等关乎中华本源文化的大问题、大思路，有助于华夏子孙寻根问祖。

中国远古文明探源

上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三皇五帝大传”系列

杨复竣 著



中华始祖

太昊

伏羲

羲

作

为“三皇五帝”之首的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始祖。他开创了6000多年前的中华远古文明。他开创先天八卦。他创制中华龙徽。他是中华国龙的鼻祖。他被民间尊为“人祖爷”。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在河南淮阳太昊伏羲陵万众朝拜太昊伏羲。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中国历史经历了八大次伏羲崇拜高潮。如今太昊伏羲陵正被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一书正是以太昊伏羲的一生传奇和他身后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论述中国古史帝王世系、中华始祖、中华龙、国祭伏羲等等关乎中华本源文化的大问题。大思路。有助于华夏子孙寻根问祖。



中国远古文明探源

上

序一 伏羲时代的中华上古文明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长 贾斌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不仅有着文字确记的编年史，还有古史传说所描述，并被现代考古发掘逐渐印证的史前文明史。这就是我们习惯说的从“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全部中华文明史。

世界上古代文明发达地区，一般都以文字、冶金和城邦国家来作为文明成熟的标志。但是不要忘了，任何文明都有其创始期和早年期。否则，成熟的文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三皇五帝”之首的太昊伏羲氏，正是中华文明创始期的代表，他所代表的这个伏羲时代应该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不少于1260年这么一个漫长的时段。伏羲可能是第一代伏羲部落的首领。但我们所说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已不仅仅是这一位首领了，而是在伏羲名号之下沿袭了许多代的伏羲首领和英雄群体的化身了。按照古史传说往往超越时空界限，和累加众人同类业绩的特点，伏羲氏正是中华远古时代文明创始期文明成果的代表。我们说伏羲氏是“一画开天”、“肇启文明”的人文始祖，正是对中华文明史上创始期的承认与归根。

（一）

太昊伏羲氏究竟有无其人？古往今来一直有两派对立的说法。被称作“疑古派”的学者，认为伏羲是神话虚拟的人物，不足征信；另一派就是“信古派”了，他们相信神话反映着传说的古史，伏羲“织网罟”、“迎嫁娶”、“画八卦”等等贡献，都是口传心授，而且是后人见得着的活生生的事实。怎么能说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呢？“疑古派”因怀疑神话人物的真实性而不承认中华文明创始期的伏羲时代的真实存在，这就不免要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了。毋庸讳言，“信古派”中确有人也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中华文明创始期的历史背景，孤立地把伏羲看成是一位智勇非凡的领袖人物，因此既不能面对“疑古派”的质疑，提供出有说服力的身份证明，也难以回答在环境那么艰苦、封闭的远古时代，一位首领能活到四五十岁就算高寿了，怎么能设想在这样短暂的生命期内，创造出需要无数辈英雄群体经过千百年勤



劳与智慧才能积累起来的那么多的文明成果呢？其实，两方面各执一端的学者，陷入了同一个误区，这就是离开了中华文明创始期的伏羲时代的真实存在，去争论一个叫伏羲的首领或名号是否存在过。如果我们按照中华文明史必有其创始期的常理，以及后来被大量的六七千年前遗址发掘所证实的那个时代的存在，伏羲时代的存在就不成问题了。既然有那么一个时代，总得有其代表人物和称谓吧！叫什么只不过是文化符号罢了，符号本身无关紧要。现代不少学者，如王国维等不正是由“疑古”发展为“信古”，进而发展为“释古”的吗？实际上，北宋“信古派”历史学家刘恕在其《通鉴外纪·伏羲氏》中，早就承认伏羲氏就是伏羲时代的名号了。他写道：“自伏羲至无怀，十五君，袭包牺（伏羲）氏之号。”这就是说，在部落首领更替的那么长的时段里，伏羲名号一直沿袭不变，大家的历史贡献也都记在伏羲名下了。

（二）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伏羲时代的历史地位呢？

第一，实现了我国原始社会由渔猎生活到农牧业生产的过渡。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人类在蒙昧荒蛮的原始社会出现文明的曙光，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的农牧业生产时代。伏羲氏作为原始农牧业的象征性人物，典籍中多有记载，《易经·系辞》说他“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唐代司马贞在《史记补·三皇本纪第一》中说他“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北宋苏辙在《古史》中说他“作网罟，以佃以渔；豢养牺牲，伏牛乘马”。这些记载古史传说的典籍，也为近现代仰韶文化前后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传说伏羲部落最早居地古成纪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不仅发现了七千年以前，被捕猎食用过的大量兽骨化石，其中豢养猪骨骸中所含碳3成分，在野猪骨骸就没有的，说明人工饲养已成规模。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已断言：“事实上伏羲是指远古畜牧业的一个时代。”

要说畜牧时代已经有了农耕生产，有的学者可能已稍后的传说人物神农氏是农耕文明的代表而提出质疑。我认为，神农时代农耕生产已经相当发展了，但伏羲时代已开始农耕生产确是不争的事实。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已发现七千年以前北方粮食黍和粟的炭化种子。考古工作者还



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差不多同时代的粟的大量贮藏，甚至发现了以剩余粮食酿酒的残存物；至于在南方，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均发现了七八千年的稻种炭化物，江西万年的要更早些，这都说明粮食作物在伏羲时代已大量生产了。其实，原始畜牧业与农耕地并不一定截然分别先后出现的，往往是因地制宜，互相促进发展起来的，畜牧业为农耕地提供了人力、畜力，农耕地又为畜牧业提供了饲料和基地。我们在阅读古籍中重点记载伏羲氏在畜牧业方面的贡献时，也不难从字里行间寻找到有关农耕文明的记载。西汉《周髀算经》有“伏羲作历度”的记述。《通鉴外记》中就有伏羲氏“以作二十四节气”、“有甲历五运”的评述，还在详列伏羲以龙纪官的命名中就有造甲历的潜龙氏昊英，又有“阴康为土龙氏，治田畴；粟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水源”。已经谈到那个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了，怎么能说伏羲时代农耕还没有开始呢？

第二，完成了由我国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转变。

随着原始农牧业的发展，因为男子在复杂、繁重的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重要，由原先以母系血亲系统为基础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转变为以父系血亲为基础的父亲氏族社会。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部落塞纳卡部族的深入调查，氏族内部禁婚，只能同外部通婚。最初是男嫁女，子女随母姓；后来才发展到女嫁男，子女才知道自己的生父，促成了父系氏族的出现。伏羲氏以前，我们知道部落女首领是风姓的华胥氏，东汉王充在《论衡·齐世篇》中说伏羲氏之前，先民“群居聚处，知其母不知其父”。自伏羲氏之后，都以男性为首领了。所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太昊，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社会的事了”。典籍记载，伏羲时代男婚女嫁已成时尚，而且，以男子猎获的脬皮（鹿皮）为礼物迎娶女方嫁给自己。当时原始蒙昧蛮荒时代的乱婚杂交已经绝迹，甚至男嫁女，子女随母姓的母系氏族社会也一去不复返了。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太昊伏羲氏》中评说伏羲氏“始制嫁娶，以脬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可见伏羲时代其所以初创文明，重要因素在于杜绝了近亲繁殖，初建了优生原则和人伦道德，同时普及中华大地的姓氏，也随着伏羲氏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而起源了。

有人也许会问，传说伏羲、女娲是华胥氏同母所生的亲兄妹，传说



中他们兄妹结婚的故事，怎么会与父系氏族社会规则相融呢？我们说这些人又把传说的伏羲、女娲看成是同血缘的生命个体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部落不同氏族的群体代表。除去神话中创世纪传说与洪水劫难传说与我们所说伏羲氏父系氏族社会背景无关外，单就氏族社会而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论述：“因为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存在。”他特别引用摩尔根用希腊语表达的这种包含两个以上氏族的部落叫“夫拉特里”（胞族）。我们所说伏羲、女娲也正是类似“夫拉特里”（胞族）的风姓部落内两个兄弟姊妹般的氏族，所谓兄妹婚就是这两个兄弟姊妹般的氏族的通婚。否则，伏羲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文明准则“制伛皮，迎嫁娶”、“正姓氏，定人伦”，岂不自我践踏，退化到毫无文明可言的蒙昧、蛮荒时代去了吗？恩格斯当时就批评过那些无视氏族本质的人，说他们“糊里糊涂不加分别的混为一谈”，“这证明人们对氏族的本质多么不理解。这便造成了不可救药的混乱”。

第三，在结绳记事和直观思维的基础上创造了文字符号和哲学原理。

人类进入文明以前，没有文字、语言贫乏、思维直观、思想简单。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大都有结绳记事的传说。伏羲时代进入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相传他始画八卦。八卦原意就是“八索”，是从结绳记事起源的，但已经是八个表达基本事物和含有哲理的文字符号了，与原始人处于蒙昧时期捕一猎物结一个结的计数方法，不可同日而语。《易经》和诸多古籍频繁记载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唐代司马贞引用这一段后，特解释为“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南宋罗泌在《路史》中说“而同文稽央，象肇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百官以制，万民以察，而文籍由是兴矣”。这里说的“书契”就是文字符号，是伏羲氏观察天地万物，思考风云变化而总结出来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个由长短笔画构成的数字符号，表达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类事物的办法。而且人们发现这八类事物两两相对。暗含着世界一分为二的太极原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各有许多同类项，可用同一符号来表意，如乾坤不仅可以表达天地，同时也可以表达阴阳、刚柔、父母等等。在不同情况下可以说出不同意思来。这些八卦符号具有高度概括性与哲理性。



对于伏羲八卦的深刻哲理及其应用价值，历来评价很高，相传自伏羲创先天八卦，周文王演绎并作后天八卦，以至孔子阐释八卦编成《易经》。对伏羲和《易经》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络绎不绝，南宋罗泌的《路史》说它“以尽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蕴尽矣”，“以逆阴阳之微，以顺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君民事，阴阳家国之事始明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从八卦阴阳爻中受启发而发现新科学的基础二进位制。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与西方科学上的交往》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基础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引进了宇宙中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阴和阳。”对于由伏羲开创先天八卦而在后来形成的《易经》，其深奥原理及普遍应用价值，在国内外众多专门的易经学家和易经论坛会作出深刻论述。因为它是数千年来融汇了无数学者的心得体会，不是我们在本文中论述的主要内容。我们只是从伏羲初创八卦的文字符号及其浅显的表意价值来说明我国最早的文字兴起。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对半坡陶器和陶器碎片上那些刻画符号，写道：“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伏羲氏所创八卦的文字符号，从其意形及规律性来讲，应该说比那些彩陶符号更进了一大步，所以唐兰先生在《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就明确指出：“我国意符文字的起源，应在太昊与炎帝时代。”

除此之外，伏羲时代红山文化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已有大量玉琮、玉饰的出土，证明制玉手工业已经发展起来。在浙江良渚和湖南澧县还发现了距今6000余年的古城遗址，说明当时已有城市建设。这些都表明伏羲时代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

伏羲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创始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三)

伏羲和炎黄“三皇”相继共创了中华民族上古文明。

在中华民古史传说中，“三皇”是古代文明创造者的代表人物。尽管对“三皇”和“三皇五帝”的表述历来有所不同，但比较普遍的也是官方认可的说法，那就是伏羲、神农（炎帝）和黄帝。按《通鉴外记》所引《春秋历序》伏羲时代为1260年，神农（炎帝）时代380年（《史记》索引说是“中间隔八帝、五百余年”），黄帝时代300年，准确年代恐怕只能靠今后的研究了。但大致已告诉我们一个上古文明从创始到早期发展的三个时段。宋代王应麟的《三



《字经》是我国流传最广的启蒙读物，其中有关我国历史的说法是：“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关于“人文始祖”的称谓，与“三皇”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一个民族有一位古老的文明创始人称“人文始祖”就足够了。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 ABC·第七章》中写道：“据《易·系辞》的‘古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文字而观，伏羲显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始神；由神话中的‘主神’变为民族文化始祖，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伏羲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人文始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太悠久了，原始古老族团的融合过程也太漫长了，于是后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的华夏族团所称颂的原始领袖炎、黄二帝也被列为“人文始祖”了。轩辕黄帝同伏羲、神农一样也是传说人物，虽然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开头从轩辕黄帝讲起，但是数千年来，不论官、民，在伏羲和炎、黄的庙陵匾联或恭读祭文中，分别都被称颂为“人文始祖”。这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规定，也不存在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意思。只是由于近现代某些历史的特殊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个别地方出现争占人文资源以发展经济的偏向，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人文始祖”厚此薄彼或重此轻彼的理解。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和抗日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革命党曾祭起炎黄旗帜，在以民族主义动员人民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就使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流行起来，随之又把“始祖”和“子孙”联系起来，以致认知“伏羲”为“人文始祖”的人倒不如认知“炎黄”为“人文始祖”的人那么多了。后来人们慢慢发觉“炎黄子孙”说法的局限性。

台湾新学识文教中心发行人李畊教授，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和传统文化传承人。他对祖国满怀深情，曾想拿出自己毕生积累的稿酬，在他的祖籍河南项城建设一个命名为“福禧”（“伏羲”的谐音）的新农村，企望在那里生活着的农民都过上文明、进步、民主、平等，共同富裕的生活。尤为可贵的是，他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多次向两岸领导人建言。1993年3月13日他在《为“中华民族始祖”正名提议，请以“羲黄”取代“炎黄”》的建言书中，列举了伏羲作为始祖的六个绝对优先条件：“（一）在中国历史中居‘百王先’的地位，为我中华民族伦理中的当然长老；（二）贡献质高、量多且对文化‘国’、‘家’特具开创意义；（三）已被民间尊为‘人祖爷’。每年朝拜盛会历时匝月，历数千年而不衰，可见伏羲民意号召力空前；（四）易学、八卦具现代学术意义，电脑有功，伏羲与易学国际声誉崇



隆；（五）陵园规模足与信史帝王比拟，官方正统地位明确；（六）为龙徽创始设计者，‘龙的传人’应以具‘龙师’及‘龙都之王’身份正位为‘龙的传人始祖’。”他还特别强调，伏羲“宜作中华民族56族类总代表，正可平衡代表汉族形象的‘黄帝’，而可显‘民族平等、团结统一’的广大深远意义”。李教授字字珠玑，声声挚爱，其身处被海峡分隔的台湾岛上，能有此根祖深情和远见卓识，实属难能可贵，可钦可敬。当然，由政府用行政手段出面“正名”的做法，还值得研究。

既然历史上已约定俗成地把伏羲与炎黄都称作人文始祖了，还是依照历史习惯的好，正可谓“三皇”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者，他们在各自所代表的时段内，以无数英雄群体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上古文明，是完成中华文明创始期和早期发展阶段的、具有古代中华各族团广泛代表性的人文始祖。民间流行的说法要顺乎自然。至于“炎黄子孙”的说法，也在民间已经逐渐被李教授所说的“龙的传人”所取代，因为不仅是伏羲氏开创了龙图腾，后来文明早期发展的代表人物炎、黄，作为伏羲的后代，也是龙文化的创造者。

（四）

伏羲氏和伏羲时代所创造的那么多在当时堪称划时代的文明成果，以及它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伏羲文化。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第一，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先进地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提高我们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以前国内流传着我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最早见于梁启超在1900年写的《二十一世纪太平洋歌的诗文》中，说“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并说这四国为“厥名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其实，洋人并没有这么说，在世界权威的历史著作中，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倒是讲过世界上共有八个文明体系，中国虽在其中，但排名靠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有名的史学巨著，他最早使用“文明单位”取代“文明国家”来研究文明史，他把6000年来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其中有商代的古中国和唐以后的中国是讲我国的，和排名在前的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相比，中国最早的文明史只



算了三千多年，这也就是我国一些史学家以殷商甲骨文为据所说的中华文明史。怪不得西方一些人一再鼓吹“西文东渐”的论调，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我国乃至远东的文明，都是从西方、从巴比伦传过来的。这种曲解，除了不顾历史事实和种族歧视等外部因素外，也同我们对上古文明史研究、宣传不够有关，这也同我们一些学者死扣条文，妄自菲薄不无关系。我们中国曾经创造过世界历史上的多次辉煌，不仅有春秋战国时代群星灿烂的百家争鸣和引以为荣的汉、唐帝国、康乾盛世，在世界文明创始期的伏羲时代，距今六七千年以前，中华民族早就开始了农牧业生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文字符号和哲学原理，在制陶、制玉以及城市建筑等等方面已遥遥领先，而且我们的文明以伏羲所开创的龙文化为亲缘和基因，世代传承，从未断流。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今天，我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要以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伟大创新精神和团结奋斗的勇气，在新时代做出无愧于我们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荣誉的伟大业绩。研究和弘扬伏羲文化，能给我们正在和平崛起的泱泱大国以精神鼓舞。

第二，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龙文化的亲和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民族自六七千年开创龙图腾以来，繁衍生息在神州大地上星罗棋布的部落，逐渐在龙图腾的旗帜下集结。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所说：“古代几个重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团族，龙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中的意义，真是太重要了。”“龙族的诸夏文化，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位文化。”与炎黄同时的蚩尤，都是伏羲氏的后裔和龙族的成员，但又不属于炎黄所代表的华夏族团，蚩尤是三苗九黎的首领，他的“八十一个兄弟”应属于东夷和南蛮集团。由于《史记》根据传说记载了炎黄打败蚩尤的涿鹿大战，惨败的蚩尤后代大都被发落到东、西南边境，今天生活在边疆的苗、瑶、彝、黎、羌、藏等少数民族，大都是他们的后裔。辛亥革命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是从汉族的正统历史地位出发的，著名的秋瑾烈士在诗文中以炎黄为旗帜激励志士仁人。她的《厥题》诗这样写道：“黄河源头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贵胄是天骄。”从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炎黄子孙”和对“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强调，加上古史传说中的族团恩怨，难免在部分少数民族心理上产生一定隔阂。鲁迅先生说得很道理：“我们都自称是炎黄子孙，但是恐怕蚩尤的子孙也没有死绝。”鲁迅先生正是以



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共处的历史高度和长远利益来讲这番话的。今日已深入人心、普遍称道的“龙的传人”，也正因为其所具有的广泛代表性和极大包容性而被海内外中华儿女所认同，我们相信，这个普遍认同的提法将同龙文化一起永久流传下去。弘扬伏羲文化将为同根同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第三，比较研究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特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世界各地，特别是古代文明发达地区，如埃及地区，美索布达米亚地区，古印度地区，古希腊地区等等，与我们中华大地，在古文明兴起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何异同？在各项标志性的文明成果上，各有什么特点？我们中华文明在哪些方面领先，在哪些方面后起？要从比较研究中总结人类文明史的规律和形成各种地域特征的原因，并阐释它们对今天各国、各民族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在与国际间互相交流，共同探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既要防止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又要防止夜郎自大，以我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态度。要以文为友，真诚相待，在学风上体现出无愧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大国风范和君子风度。《易经·贲卦象辞》说：“观乎人文，以成化天下。”文化或文明，是要传播天下的，它早于国家的出现，虽然以后随着各国家的历史而发展，但“文化无国界”。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异彩纷呈的各国的文化互相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

杨复峻研究员百余万言的《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中国远古文明探源》论述了中国古史帝王世系、中华始祖、中华龙、中国本源文化、国祭伏羲重大问题作了论述，这是对于伏羲文化的深入研究与贡献，当付梓出版之际，顺致祝贺。

2008年8月1日于北京

序二 杨复竣先生《中华始祖太昊伏羲》

李燕杰

杨复竣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朋友。他生在伏羲故都河南淮阳，又长期工作在伏羲故都淮阳，长期从事伏羲文化研究，勤奋、执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令人欣喜的成绩，特别是《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中国远古文明探源》即将出版，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杨先生多年以来，每天凌晨三点开始写作，不怕艰苦，不辞辛苦，视伏羲研究为生命，他已经出版了《人祖传说故事》、《易经传说》、《易经神话传说》以及《伏羲创世纪》、《中华万姓同根》、《伏羲大帝演义》等，研究伏羲的著作已有十三本，还写了32集电视连续剧《伏羲》。真的“位卑不敢忘忧国”，当他意识到东方文化受到严重挑战时，充满了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竭诚尽智，不遗余力地研究创作，为我们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

我生活在国学之家，家父随梁任公诸先生攻国学，又在北京大学国学馆研修国学，多年以来与尚节之等易学大师为友，所以我自幼受家庭熏陶，后来长期在大学讲文学史、文化史、图书史时，一直在研习伏羲文化、易学等，同时又到淮阳、天水、新乐等地调查研究，并多次在美国、德国、日本讲伏羲文化，并于20世纪90年代创办羲黄文化研究院，请薄一波、程思远、牛满江、吴阶平等大家任名誉院长，请张岱年教授为院长，我当第一副院长自此之后，团结了一些专家学者从事伏羲文化研究。我在此期间受到多方面的启示。我在欧洲讲学时，专门讲《白龟、八卦、易经》，还写过许多相关的文章，特别是结合大地湾出土的文物，进一步阐发伏羲氏的存在及其时代价值。我很赞成杨先生的见解，伏羲氏是居于炎帝、黄帝之前的中华民族始祖，他还论证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同归一源，万姓同根。这种本源文化利于中华民族大统一大团结，大和谐。这些我们彼此有着共同的见解。为此，我愿向他学习并大力支持他的研究，并愿向广大中外读者推介他的研究成果。

最后我想说：



序 二

杨复竣先生《中华始祖太昊伏羲》

“大本大元求大智，
大爱大美利大成，
求真求善又求美，
立德立言再立功。”
愿以此与杨先生及广大读者互勉互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智慧书苑

序三 用生命描绘中国神话的伏羲时代

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教授 高有鹏

杨复竣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几十年来，他与他家乡河南省淮阳太昊伏羲陵形成了特殊的联系。黝黑的面容、明亮的头顶、深深的皱纹，都是他献身于伏羲文化的见证。我曾经多次称他是中国文化杰出的“守陵人”。一个人，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研究与宣传伏羲这位“人祖爷”的事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人生的奇迹，是文化的奇迹。现在，他捧出关于伏羲研究的煌煌三卷巨著，令人惊诧，令人感动。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是中国神话学面向世界生长出的重要理论硕果。

他依靠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凭借自己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描绘出中国神话伏羲时代灿烂辉煌的文化景观；同时，他在事实上建构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伏羲学。三卷巨著，堪称关于伏羲神话传说的百科全书。这里不仅仅包含着一个学者的心血与汗水、聪明与智慧，更包含着一个学者沉重的使命与责任。

我多次呼吁应该将河南省淮阳县的太昊伏羲陵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历史文化，其丰富、独特、珍贵，尤其少见。

伏羲神话是中国神话时代中一个确立了“人”的重要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关于人的发现与人的生长、发展的阶段，是我们民族真正成为文明意义上的民族的开端。

所谓神话时代，是按照神话的具体内容所呈现出的社会性质相对划分的。无论这种时代是否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而作为神话对人类进步的足迹所形成的折射，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古人把神话时代的那些帝王概括为三皇五帝^①，而对三皇和五帝则又有不同的理解。今天，在我们明白了神话和历史的分野时，我们会很容易地避开历史化的误区，但前人划分的依据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当然，所谓的三皇五帝与我们所说的神话时代，

^① “三皇五帝”的称谓始见于《吕氏春秋》，此前《孟子》、《荀子》中已有“三王五霸”，这不是原始神话，而是政治神话；但他们的出现是有历史文化根据的，具有文化英雄的痕迹。



是有着重要区别的。关于这一点，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著作，都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我在这里所提出的神话时代及其划分的方法，既有像吕思勉、徐旭生等学者依据古文献并进行相应的神话内容分析，又有更为重要的田野作业即科学考察所发现的意义显示。我们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神话时代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盘古时代。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开端，标志着天地的生成。二、女娲时代。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女性占据特殊地位的阶段关于人类诞生的文化阐释的体现，生育成为这一时期的母题内蕴。三、伏羲时代。它的主要内容是文化（文明）初创，包括渔猎文明的发生。四、炎帝神农时代。这是农耕文明的开创时代。五、黄帝时代。这是中国神话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它一方面是原始文明的集大成，一方面第一次以无比辉煌的神性业绩筑构成庞大的神系集团，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六、颛顼帝喾时代。其神性业绩主要在于绝地天通，这一时代的文化内核是巫成为社会精神的支柱。七、尧舜时代。这是关于政治理想的神话，以禅让为核心。八、大禹时代。洪水神话成为大禹神性业绩的基本背景；同时，这一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神话时代的终结。我这样勾勒中国神话时代，以古典文明为划分依据，并不排斥少数民族的神话时代与神话系统。也就是说，这样论述并不意味着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整体观念相悖，而是说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各自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神话。在古典文化中所展现的中国神话时代和神话系统，与各少数民族中的神话内容，都来自记忆中的口头描述。从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汉民族的神话，也同样包容着许多非汉民族的文化成分；若没有民族的交融与联系，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关于中国神话时代的基本划分，我们必须看到文明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神话时代中神性主角与原始文明的密切联系，尤其不能以记录时代的早晚来判断其先后。如关于盘古时代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盘古神话的记述在文献上的出现比其他神祇都要晚。三国时期吴国太常徐整最早在《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中提到了盘古神话，显然，盘古神话只是根据那个时代的流传状况被记述下来，而它应该是在在此之前很久就已经流传了的。同时，关于徐整的出身问题，也是理解盘古神话包括其发生地望即南来说或北来说的重要前提。追本溯源，徐氏一族出自涂山氏，其地望是在“昔



三代皆居”的河洛地区；待武王伐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殷民六族封鲁的大事件，在殷民六族中就有徐氏。《左传·定公四年》显示出这一内容。西周时期的徐氏，居住地主要在山东（历史上山东有三个徐州，一在今滕县官桥附近，一在东平舒县，一在曲阜以东）；周人多次伐徐，才使他们南迁至今江苏省所属的徐州，成为徐氏族人主要聚居徐州的重要背景，再到后来，在公元前512年，发生了吴人灭徐的事件，徐氏族人再次大规模迁徙，一部分移至越国，一部分仍居留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到了公元前494年，距吴人灭徐已有18年，吴又打败了越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越人的集中地在会稽，距吴人集中地姑苏较近，越人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秘密联络，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左传·哀公十三年》有这样一段记述：

六月丙子，越于伐吴，为二隧。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太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

姑蔑之旗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徐人参战。徐人为何参加这次复仇战争？源自当年吴人灭徐时，一部分徐氏族人迁到越国，那么，很自然就有了越人与徐人联合抗吴的举动。从如今的考古发现来看，吴越地区的青铜器与吸收中原地区的技术有密切联系，这种技术的传入就是与徐人分不开的。今天的吴越腹地浙江、江苏一带有徐偃王的许多传说，有些地方还建有徐偃王庙，徐氏成为有很大影响的族系；徐整作为吴人，当属偃正一系，其祖先当居中原，那么，他记述盘古神话就可能不排除中原遗民的口头记述成分，更何况徐整的著述名为“三五历纪”、“五运历年纪”，是很典型的源自北方的道家文化概念，与吴越文化相异，仅以徐整为“吴人”就断言盘古神话属于南方民族，显然是无力的。尤其是历史上太行山被称作五行山，三才五行学说发生在北方，徐整为中原人后裔，记述北方遗民流传的盘古神话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民族迁徙留给我们的文化之谜太多了。现在，不仅中原地区发现大量盘古神话，在甘肃、河北、山西、陕西一带也发现许多盘古神话，这就说明盘古神话并非仅在南方民族中流传，在其他地区同样有。所以，结合上述材料，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盘古神话作为我国古典神话的第一个时代。关于女娲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女娲在文献中较早的出处是《山海经》，而且记述颇为模糊，就一句“有神人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并没有体现出《楚辞·天问》中“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造人意义。关于女娲抟土造人，最早是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明确提出的。“女娲之肠”的“肠”字的文化阐释，在这里就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肠的最早写法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左侧的“月”，一部分是右上半侧的“曰”，一部分是右下半侧的“易”，它们所显示的意义是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尸生崇拜”。“月”的古义是指肉，包含着古代的牺牲制度以及生殖崇拜等含义。“易”则体现了猪或酒等祭品的指示意义，同样表明牺牲制度。那么，由此可知，女娲之肠的意义与抟土造人的意义应该是相通的，其媒介就是在许多古老民族中间都曾经发生过的“尸生崇拜”，“肠”字中的“月”旁就是这种原始崇拜的意义显示的典型。伏羲的“伏”与“羲”呢？在记忆理论上讲，同样是值得我们多角度认真研究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理解神话时代，不能忽视原始歌舞作为文化背景的存在。神话的存在意义不仅是为某种文化事项作阐释意义上的“文本”，而是从整体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今天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些古庙会上民间百姓把这些远古大神作为他们的保护神或祖先、祖师进行异常虔诚地敬奉。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对这种现象的综合描述：

昔葛天氏之作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原始神话的主角无疑是原始大神，而这些原始大神或者是氏族部落的首长，或者是人们总结自己的经验所想象出来的祖先；在每一尊神像的背后，都闪放出远古人民智慧的光辉。正由于这种原因，我把整个中国神话时代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神性的构成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不同的神话时代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处的位置不同。如，黄帝时代之前，包括盘古神话、女娲神话、伏羲神话在内，一般是单体神性，即使有一个以上的，也被描述成兄妹婚姻中的夫妇；而到黄帝时代，这种局面就被打破了。实际上，这种局面在炎帝神农时代就已经出现，其内容是在炎黄战争中具体表现出来的。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许